

# 被征地农民的经济获得感提升了吗？\*

赵晶晶 李 放 李 力

**摘要：**被征地农民的经济获得感是检验征地制度改革成效的“试金石”。本文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利用 Probit 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有序 Probit 模型分别从横向比较和纵向变化两个维度检验了征地对农民经济获得感的影响。以“本户在村中经济条件的自评”来测度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发现征地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货币补偿和社保安置等多元补偿方式能够显著提升被征地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以“征地后生活水平变化的自评”来测度被征地农民的纵向经济获得感，发现多元配套的补偿方式同样能够显著提升被征地农民的纵向经济获得感。

**关键词：**土地征收 被征地农民 经济获得感 征地补偿方式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保护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点“三农”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全国范围内的征地高歌猛进，大量农民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地及土地所承载的就业、养老等保障，土地的财产权益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此中国启动了多轮以补偿安置、征地范围以及征收程序等为核心内容的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点，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4〕71 号）等相关政策文件。2019 年 8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明确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基本原则。那么，这一系列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举措，是否维护了被征地农民的财产权益，是否提升了被征地农民的获得感？

2015 年 2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将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这标志着“获得感”一词开始进入中央最高决策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农民获得更多土地财产权益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7ZDA076）、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深度城镇化背景下失地退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与补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KYCX18\_07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本文通讯作者：李放。

层的视野与话语体系中（李鹏、柏维春，2019），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衡量改革客观投入与民众实际获得感知的重要绩效指标，其内容是全方位、多维度的，包括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民生获得感等多方面（文宏、刘志鹏，2018）。由于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无下降，财产权益是否受损，所以将重点探讨经济获得感。目前学界围绕经济获得感开展的实证研究不多，王瑜（2019）基于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评估电商参与对农户经济获得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电商参与显著提升了农户的横向现实和纵向预期经济获得感。梁土坤（2019）基于全国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数据，使用多项 logistic 模型探讨社会政策对困难家庭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发现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政策对困难家庭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尚未见到有研究者将经济获得感这一主观感知变量用来衡量被征地农民福利状况的改善。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实地调研数据，运用 Probit 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以及有序 Probit 模型探讨征地对农民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在土地制度进行深化改革的当下，关注这一主题，无疑有助于评价征地制度的改革成效，也能为进一步完善征地补偿安置政策提供依据。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关注被征地农民的经济获得感，并从横向比较和纵向变化两个维度来探讨征地对农民经济获得感的影响；第二，使用最新的四川、贵州、安徽、浙江以及江苏 5 省 6 个土地改革试点地区的实地调研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最后总结全文并讨论政策含义。

##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 （一）文献回顾

1978 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经济建设，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推动了土地大规模征用，随之被征地农民的权益保护与福利状况成为了学界的研究热点和重点。早期研究显示，征地补偿标准低、补偿分配不合理、就业渠道狭窄、社会保障制度缺失以及缺乏相对规范的土地出让收益管理和使用制度等，导致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陷入可持续生计困境，福利状况严重受损（王小映等，2006；孙绪民、周森林，2007；陈莹、张安录，2007）。高进云等（2007）基于武汉市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模糊评价方法测算发现被征地农民的总福利水平略有下降，农民的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心理状况以及社区生活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恶化。邓大松和王曾（2012）通过对广东省佛山市的调查发现被征地农民存在相对收入减少、职业发展困难、社会保障薄弱等问题。袁方和蔡银莺（2012）基于 2010 年武汉市江夏区的实地调研数据，研究发现被征地农民的农业收入普遍减少，生活成本上升，消费支出增加，尤其老人的经济福利严重受损。王伟和马超（2013）基于江苏省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指出农民被征地后其家庭经济状况较之前有所恶化，家庭农业收入减少的同时，非农收入亦无法在短期内有所改善。周义和李梦玄（2014）基于实地调研数据，测算发现农户失地后综合福利水平下降，而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保障等保障农民长远生计的子维度福利降低所导致的。

近年来，随着征地制度持续深化改革，“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

规范、多元保障机制”等政策方针的提出,被征地农民的福利状况有着不同程度的改善。胡清华等(2019)运用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失地农民福利的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发现湖南省失地农民的福利状况有所增加,但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细分来看,在经济收入方面,梁韵妍(2016)基于广东省被征地农民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征地后农民的收入总额较被征前有所提升,但存在暂时性与不稳定性。汪险生和郭忠兴(2017)利用全国大规模的调研数据进一步实证研究得出征地能够提高被征地农民的经济收入,尤其是非农就业水平较低的地区。在就业创业方面,戚晓明(2017)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4)的数据考察发现被征地农民群体就业分化明显,总体就业质量良好。征地整体推动了被征地农民的就业转换,征地以后,农户配置的农业劳动力显著下降,退出的农业劳动力主要转换到本地非农就业上(汪险生等,2019)。在社会保障方面,屈静晓等(2016)基于长沙市被征地农民的实地调研数据研究发现,农民被征地后的养老保障水平较被征前略有上升。

可以看出,已有文献多从经济收入、消费支出、社会保障水平等客观指标评估现有的征地政策,本文则尝试使用经济获得感这一主观感知变量指标来衡量被征地农民福利状况的改善,以进一步验证征地对农民的影响。

## (二) 理论分析

获得感是指人们在改革和发展客观过程中对自身实际所得的主观评价(王浦劬、季程远,2018),而人们的主观评价形成机制大多是基于参照群体理论、社会比较理论来阐释的,选择“与谁参照”、考虑“如何比较”是其中的内在逻辑(王元腾,2019)。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先驱者费斯廷格于1954年最早提出社会比较理论,其认为人们希望能够正确地评价自己的观点与能力,在缺乏直接的客观标准时,人们通过与他人比较进行自我评价。而正常来说,人们倾向于将自己与相同水平的个体进行比较,而后评定自己的水平(泰勒等,2004)。默顿(2015)认为社会结构是影响人们选择参照群体的决定因素,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会直接影响人们对于参照群体的选择。那些拥有相同的社会结构位置的人们,更加容易成为彼此之间的参照对象(庄家焱,2016)。最重要的参照对象无疑是他人,但个体难以找到比较对象时,自己过去的状态也可考虑作为参照对象,即与自己的历史状况进行纵向比较(刘得明、龙立荣,2008)。

因此,对于获得感这一主观感知变量,本文选择通过与具有相同社会结构位置的他人进行横向比较及与自我的过去状态进行纵向比较两个方面来衡量。本文重点关注的是经济获得感,是指个体基于其实际经济收入的主观满意程度(杨金龙、张士海,2019),是对经济收入的主观评价(王恬等,2018),分为群体比较的横向经济获得感和时间比较的纵向经济获得感两个方面。横向经济获得感是通过与他人经济状况的对比而做出的主观判断,纵向经济获得感是个人当前经济状况与过去经济状况对比的心理感知,侧重于历时效应的考察(杨金龙、张士海,2019)。由于研究对象是被征地农民,在横向比较方面,拥有土地是农民与社会其他身份的人群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城镇居民和未征地农民均可作为被征地农民的参照群体,但是相对而言,未征地农民更符合“相似性”的特征。对于农民来说,同一个村落的其他农民群体的信息相对比较容易获取或熟悉,同时彼此又有着相同的社会结构,因而选择未征地农民作为横向比较的参照群体更加恰当,具体以“本户在村中经济条件的自评”作为测度

指标。在纵向比较方面，则选择自我被征地前的状况作为参照对象，具体以“土地被征地后生活水平变化的自评”作为测度指标。

另外，现有一些文献基于不同的数据和方法，研究发现征地能够显著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社会保障水平等多方面的客观获得，而个体基于客观的获得势必会提升主观获得感（项军，2019）。对被征地农民来说，不同的征地补偿模式会直接导致其客观获得的差异，进而可能会对其主观获得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承包地的征地补偿政策来看，全国各地的做法各有差异，目前被征地农民可获得的征地补偿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单一的货币补偿和多元的货币补偿、社保安置和就业安置等。在单一的货币补偿方式下，被征地农民获得的一次性补偿属于“暂时收入”，而在货币补偿的基础上，配套的社保安置、就业安置能够提高永久收入（张弛、杨燕绥，2015）。此外，养老保险作为社保安置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具有养老风险防范的功能，能够降低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可以在增强心理效用上进一步提高其主观幸福感和获得感（马红鸽、席恒，2020；程名望、华汉阳，2020）。因而，相较于单一的货币补偿，货币补偿加上社保安置等多元补偿对被征地农民经济获得感的提升效应更大。

###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农民获得更多土地财产权益的体制机制创新研究”课题组于2019年2月~4月开展的实地调研。课题组先将农村“三块地”改革的33个试点地区根据地理位置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调查遵循多阶段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原则，先在三个地区中各随机抽取两个代表性县（区），分别为四川省泸县、贵州省湄潭县、安徽省金寨县、安徽省定远县、浙江省义乌市以及江苏省武进区6个县（区），再根据每个县（区）国土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如近10年发生过较大规模征地的村庄、各乡镇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在各县（区）选取4~6个代表性乡镇（街道），在每个代表性乡镇（街道）抽取2~4个样本自然村（小区），再在每个样本村（小区）随机选择10~15名农民作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采用入户调查的形式，问卷的内容包括受访者个人信息、家庭经济情况、征地及其补偿标准等。本次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1118份，其中东部353份（31.57%），中部368份（32.92%），西部397份（35.51%），由于承包地与宅基地的补偿方式差距较大且只被征收宅基地的样本过少，所以重点考察承包地被征的征地补偿方式，删去只被征收宅基地的样本，再剔除部分关键信息缺失和极值的样本后，最终用于本文分析的有效样本共901个。

####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经济获得感，包括横向经济获得感和纵向经济获得感两个维度。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采用问卷中的“您认为您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在村中（老家）属于何种水平”来测度，把“下等”“中上等”分别赋值为0和1。被征地农民的纵向经济获得感采用问卷中的“您认为征地后生活水平有没有发生变化？”来测度，将“有所降低”“持平”“有所提高”依次赋值为0、1和2。

2.核心解释变量。在探讨被征地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时，由于参照群体是未征地农民，所以核

心解释变量选用是否被征过地这一变量，若农户家中发生过征地行为，赋值为 1，若未发生过征地行为，赋值为 0。在探讨被征地农民的纵向经济获得感时，由于参照对象是自我被征地前的状况，研究群体均为被征地农民，所以核心解释变量选用与被征地农民收入补偿紧密相关从而直接影响其获得感的征地补偿方式这一变量。本文通过问卷中“您家被征收承包地的补偿方式有哪些？”来定义，将单一货币补偿赋值为 0，货币补偿和社保安置等多元补偿赋值为 1。另外，借鉴已有相关研究（聂伟，2019；汪险生、郭忠兴，2017；马红鸽、席恒，2020），本文控制了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等个人、家庭及地区特征变量，同时还引入了反映村庄特征的变量。

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反映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的变量均值为 0.660，表明 66%的农民将其家庭经济条件自评为中上等；反映被征地农民纵向经济获得感的变量均值为 1.278，表明被征地农民认为征地后生活水平较之前相比介于“持平”与“有所提高”之间。在征地特征方面，49.2%的样本对象发生过征地行为；被征地的时间平均约为 5~6 年；68.2%的被征地农民获得了货币补偿和社保安置等多元配套的土地补偿方式。在个体、家庭特征等方面，样本对象的平均年龄略高于 58 岁，其中男性占 58%；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健康状况位于“一般”和“好”之间；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占 38.6%；20.8%的样本对象或其亲属担任过村干部；样本对象对其家庭社会关系网的自评等级为一般。另外，样本的均值差异检验显示，被征地组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显著高于未征地组农民，差值在 5%水平下显著。同时，相较于未征地组农民，被征地组农民在个人家庭特征方面表现出男性偏多、健康状况较好、家庭社会关系网络较宽泛等特征。

表 1 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和赋值	全样本	被征地组	未征地组	均值差 T 检验
横向经济获得感	您认为您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在村中（老家）属于何种水平：下等=0，中上等=1	0.660	0.693	0.629	-0.064** (0.032)
纵向经济获得感	您认为征地后生活水平有没有发生变化：有所降低=0，持平=1，有所提高=2	—	1.278	—	—
土地被征	是否被征过地：否=0，是=1	0.492	—	—	—
征地补偿	补偿方式：单一货币补偿=0，货币补偿和社保安置等=1	—	0.682	—	—
征地时间	最近一次土地被征至今的时间（年）	—	5.686	—	—
性别	女=0，男=1	0.580	0.634	0.528	-0.106*** (0.033)
年龄	连续变量（岁）	58.263	58.704	57.836	-0.868 (0.755)
户主	否=0，是=1	0.599	0.634	0.566	-0.068** (0.033)
婚姻状况	是否有配偶：否=0，是=1	0.948	0.959	0.937	-0.022 (0.015)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0，初中=1，高中及以上=2	0.537	0.553	0.522	-0.031 (0.044)

被征地农民的经济获得感提升了吗？

健康状况	差=0, 一般=1, 好=2	1.363	1.314	1.410	0.096* (0.052)
工作状况	您目前是否从事非农工作: 否=0, 有=1	0.386	0.406	0.367	-0.039 (0.032)
是否有村干部	您或您的亲属有没有人担任过村干部: 否=0, 有=1	0.208	0.181	0.234	0.053** (0.027)
家庭社会关系网络	您觉得您家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否广泛: 狭窄=0, 一般=1, 宽泛=2	1.043	0.986	1.098	0.112** (0.053)
村庄交通条件	差=0, 一般=1, 好=2	1.636	1.576	1.694	0.118*** (0.046)
村庄基础设施条件	差=0, 一般=1, 好=2	1.505	1.515	1.496	-0.019 (0.048)
西部	其他=0, 西部地区=1	0.383	0.415	0.352	-0.063** (0.032)
中部	其他=0, 中部地区=1	0.321	0.287	0.354	0.067** (0.031)
东部	其他=0, 东部地区=1	0.296	0.298	0.295	-0.003 (0.030)

注: ①\*\*\*、\*\*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②括号中为标准误。

### (三) 模型设定

1. Probit 模型。在考察征地对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的影响时, 由于横向经济获得感变量是二分类变量, 因而选择 Probit 模型, 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y_i = \beta_0 + \beta_1 land_i + \gamm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1) 式中,  $y_i$  表示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  $land_i$  表示是否被征过地;  $X_i$  为控制变量, 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变量;  $\varepsilon_i$  为随机误差项。

2. 倾向得分匹配法。参照经典的反事实分析框架, 将样本根据是否被征过地分为两类, 处理组 (被征地组) 和控制组 (未征地组)。具体思路如下:

第一, 计算倾向得分值。基于研究目的, 并借鉴已有相关文献, 选用样本对象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及地区特征变量作为协变量, 运用 Logit 模型计算样本对象是否被征地的倾向得分值。

第二, 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根据倾向得分值的大小对样本进行匹配处理, 为保证匹配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采用了四种主流的匹配方法: K 近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以及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第三, 计算平均处理效应。由于本文主要分析的是征地对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的影响, 即被征地后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的变化情况, 所以关注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 (ATT), 其表达式为:

$$\widehat{ATT} = \frac{1}{N_1} \sum_{i: D_i=1} (y_i - \widehat{y}_{0i}) \quad (2)$$

(2) 式中,  $N_1$  表示处理组样本的数量,  $\sum_{i: D_i=1}$  表示仅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加总,  $y_i$  表示被征地农民  $i$  的横向经济获得感,  $\widehat{y}_{0i}$  表示被征地农民未被征地时其横向经济获得感的估计值。

3. 有序 Probit 模型。在考察被征地农民的纵向经济获得感时, 由于纵向经济获得感变量为有序分类变量, 故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Y_i = F(\beta compensation_i + \gamma X_i + \varepsilon_i) \quad (3)$$

(3) 式中， $Y_i$  表示被征地农民的纵向经济获得感； $compensation_i$  表示征地补偿方式； $X_i$  为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地区特征等变量； $\varepsilon_i$  为随机误差项。

$$Y_i = \begin{cases} 0, & Y_i^* \leq r_0 \\ 1, & r_0 < Y_i^* \leq r_1 \\ 2, & r_1 < Y_i^* \end{cases} \quad (4)$$

(4) 式中， $Y_i^*$  是  $Y_i$  背后存在的不可观测变量，称为潜变量； $r_0 < r_1$  为待估参数，称为“切点”。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 征地与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

1. 基准回归结果。以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否被征过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使用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从平均边际效应来看，被征地农民比未征地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高出 9.6%，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征地能够显著提升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在控制变量方面，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现为女性群体的横向经济获得感高于男性群体；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其横向经济获得感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表现为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越强。从家庭特征来看，是否有村干部变量、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变量均对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地区特征变量对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在东部地区，如浙江省、江苏省，没有表现出显著的高水平。

表 2 征地对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横向经济获得感	平均边际效应
土地被征	0.292*** (0.103)	0.096*** (0.033)
年龄	0.002 (0.005)	0.001 (0.002)
性别	-0.244* (0.143)	-0.080* (0.046)
婚姻状况	0.250 (0.163)	0.082 (0.053)
户主	0.106 (0.116)	0.035 (0.038)
受教育程度	0.128 (0.088)	0.042 (0.028)

被征地农民的经济获得感提升了吗？

健康状况	0.268*** (0.068)	0.088*** (0.021)
工作状况	0.011 (0.095)	0.003 (0.031)
是否有村干部	0.414*** (0.151)	0.136*** (0.049)
家庭社会关系网络	0.309*** (0.062)	0.101*** (0.019)
村庄交通条件	0.071 (0.078)	0.023 (0.025)
村庄基础设施条件	0.107 (0.069)	0.035 (0.022)
中部地区	0.205 (0.131)	0.067 (0.043)
东部地区	0.120 (0.143)	0.039 (0.047)
常数项	-1.209*** (0.397)	—
观测值	901	—
Prob > chi2	0.0000	—

注：①\*\*\*、\*\*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汇报的是聚类到村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2.稳健性分析。一般而言土地征收决策由政府做出，而非单个农户，但是政府并非随机决定一项征地方案，而且还可能存在不可观测因素（或者遗漏变量）同时与被解释变量及征地决策变量相关（汪险生、郭忠兴，2017）。因此，为降低样本选择偏差和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产生的影响，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上文的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表 3 报告了采用 K 近邻匹配（K=1）的检验结果，匹配后各变量的标准偏误值大都小于 10%，且 T 检验的结果都不拒绝被征地组与未征地组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表明 PSM 有效减少了两组样本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其余匹配方法的检验结果与表 3 类似，限于篇幅，本文不再重复列出。

表 3 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样本	被征地组	未征地组	标准偏误 (%)	误差消减 (%)	T 值	P 值
年龄	匹配前	58.704	57.836	7.7		1.15	0.250
	匹配后	58.545	57.878	5.9	23.2	0.87	0.384
性别	匹配前	0.634	0.528	21.6		3.24	0.001
	匹配后	0.630	0.621	1.9	91.3	0.28	0.780
婚姻状况	匹配前	0.959	0.937	10.2		1.53	0.126
	匹配后	0.961	0.963	-1.0	89.9	-0.18	0.859

被征地农民的经济获得感提升了吗？

户主	匹配前	0.634	0.566	14.1		2.11	0.035
	匹配后	0.628	0.602	5.2	63.3	0.77	0.444
受教育程度	匹配前	0.553	0.522	4.7		0.71	0.479
	匹配后	0.549	0.556	-1.0	77.9	-0.15	0.881
健康状况	匹配前	1.314	1.411	-12.5		-1.88	0.061
	匹配后	1.317	1.246	9.2	26.3	1.31	0.192
工作状况	匹配前	0.406	0.367	8.1		1.22	0.224
	匹配后	0.405	0.437	-6.6	18.5	-0.96	0.337
是否有村干部	匹配前	0.181	0.234	-13.1		-1.96	0.050
	匹配后	0.184	0.175	2.3	82.7	0.35	0.724
家庭社会关系网络	匹配前	0.986	1.098	-14		-2.1	0.036
	匹配后	0.998	0.922	9.5	32.1	1.44	0.150
村庄交通条件	匹配前	1.576	1.694	-17.2		-2.59	0.010
	匹配后	1.600	1.579	3.0	82.6	0.42	0.675
村庄基础设施条件	匹配前	1.515	1.496	2.6		0.39	0.693
	匹配后	1.522	1.446	10.5	-298.4	1.49	0.138
中部地区	匹配前	0.287	0.354	-14.4		-2.16	0.031
	匹配后	0.290	0.303	-3.0	79.4	-0.44	0.656
东部地区	匹配前	0.298	0.295	0.7		0.11	0.916
	匹配后	0.294	0.322	-6.0	-759.8	-0.88	0.379

本文分别使用了 K 近邻匹配 (K=1 和 K=4)、半径匹配、核匹配以及局部线性回归匹配四种方法来测算征地对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如表 4 所示。采用上述四种方法测算出的 ATT 值分别为 0.128、0.096、0.097、0.102 和 0.116,并且在 1%、5%、1%、1%和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可以看出,基于不同匹配方法得出的 ATT 值和显著性虽略有差异,但仍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表明征地能够显著提升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说明上文通过 Probit 模型实证分析出的征地对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的提升效应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 4 征地对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的平均处理效应

匹配方法	被征地组	未征地组	ATT 值	标准误	T 检验值
K 近邻匹配 (K=1)	0.690	0.562	0.128***	0.047	2.70
K 近邻匹配 (K=4)	0.690	0.593	0.096**	0.037	2.57
半径匹配	0.689	0.592	0.097***	0.035	2.81
核匹配	0.690	0.587	0.102***	0.033	3.06
局部线性回归匹配	0.690	0.573	0.116**	0.047	2.47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3.样本回归。基于上文的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征地显著提升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接下来围绕征地补偿方式和户籍是否发生变化,进一步探讨征地对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的影响。

(1) 征地补偿方式。总结调研地区的补偿政策和样本数据来看,目前被征地农民可获得的征地补

偿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单一的货币补偿和多元的货币补偿、社保安置和就业安置等。其中，多元化的补偿方式以货币安置和社保安置为主，于是根据征地补偿方式将样本划分为“单一货币补偿”和“货币补偿和社保安置等”两组，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出，不同征收补偿方式下，征地对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的提升效应存在差异，当补偿方式只有单一的货币补偿时，征地对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货币补偿和社保安置等多元补偿则能显著提升被征地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这一变量在 1% 的统计水平显著且边际影响为 0.113。即货币补偿加上社保安置等多元补偿比单一的货币补偿对被征地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表明在货币补偿的基础上，以养老保险为核心的社保安置能够增强农民的养老安全感，继而有效提升其获得感。

(2) 户籍是否发生变化。根据调查对象的户籍性质，将样本分为“征地后户籍未发生变化（仍为农业户籍）”和“征地后户籍发生变化（农转非）”两组，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当被征地农民的户籍未发生变化时，征地对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边际效应为 0.095，当被征地农民的户籍发生转变时，征地对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同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边际效应为 0.112。可以看出，无论被征地农民的户籍是否发生变化，征地均能够显著提升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理论上来说，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户籍身份的转变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整体保障和福利水平，增强其抗风险能力，进而提升其幸福感（霍鹏等，2018）。但是，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户籍身份是否发生变化对被征地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提升效应的差别并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被征地农民虽然通过“土地征用”这一途径实现户籍身份的转变，但是户籍身份背后蕴含的教育、公共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福利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表 5 征地对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影响的组群差异

	征地补偿方式				户籍是否变化			
	单一货币补偿		货币补偿和社保安置等		否		是	
	系数	平均边际效应	系数	平均边际效应	系数	平均边际效应	系数	平均边际效应
土地被征	0.196 (0.148)	0.066 (0.049)	0.355*** (0.108)	0.113*** (0.034)	0.288*** (0.110)	0.095*** (0.035)	0.350** (0.167)	0.112** (0.05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132** (0.463)	—	-1.342*** (0.471)	—	-0.972** (0.387)	—	-1.742*** (0.502)	—
观测值	599	599	760	760	818	818	541	541
Prob > chi2	0.0000	—	0.0000	—	0.0000	—	0.0000	—

注：①\*\*\*、\*\*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汇报的是聚类到村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控制变量同表 2，限于篇幅详细结果未予汇报。

## (二) 被征地农民纵向经济获得感的探讨

以被征地农民的纵向经济获得感（被征地后生活水平变化的自评）作为被解释变量，征地补偿方

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有序 Probit 模型进一步检验征地对被征地农民纵向经济获得感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 6。

表 6 征地补偿方式对被征地农民纵向经济获得感影响的回归结果

	方程1		方程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征地补偿方式	0.204*	0.110	0.236*	0.125
年龄	—	—	0.024***	0.006
性别	—	—	0.129	0.229
婚姻状况	—	—	0.095	0.332
户主	—	—	-0.143	0.189
受教育程度	—	—	0.120	0.095
健康状况	—	—	0.159*	0.085
工作状况	—	—	-0.058	0.137
户籍是否变化	—	—	-0.068	0.168
是否有村干部	—	—	0.084	0.140
家庭社会关系网络	—	—	0.127*	0.074
村庄交通条件	—	—	0.021	0.092
村庄基础设施条件	—	—	-0.023	0.107
征地时间	—	—	0.063***	0.022
中部地区	—	—	0.364**	0.174
东部地区	—	—	-0.101	0.174
Constant cut1	-0.778	0.097	1.481	0.472
Constant cut2	0.245	0.116	2.566	0.479
观测值	443	—	443	—

注：①\*\*\*、\*\*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表中标准误是聚类到村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方程 1 和方程 2 检验了征地补偿方式对被征地农民纵向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其中方程 1 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没有控制其他变量时，征地补偿方式变量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方程 2 加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相关控制变量时，征地补偿方式变量仍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进一步计算出其边际效应（见表 7），相较于单一货币补偿，货币补偿和社保安置等多元补偿方式能使被征地农民自评生活水平“有所降低”“持平”的概率分别下降约 5.8%和 3.0%，“有所提高”的概率增加约 8.7%。这表明多元配套的补偿方式能够显著提升被征地农民的纵向经济获得感。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年龄、健康状况以及家庭社会关系网络变量均对被征地农民的纵向经济获得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分别在 1%、10%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年龄越大、健康状况越好以及家庭社会关系较宽泛的被征地农民，其纵向经济获得感越强，即认为失地后的生活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此外，征地时间变量对被征地农民的纵向经济获得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征地时间越长，被征地农民纵向经济获得感的提升越显著。征地后的户籍是否变化变量未对被征地农民的纵向经济获

得感产生显著影响，说明征地后户籍身份的变化，不是影响被征地农民纵向经济获得感的核心因素。在征地区域方面，中部地区的被征地农民的纵向经济获得感高于西部地区，并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较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被征地农民自评生活水平“有所降低”“持平”的概率分别下降约 8.9%、4.6%，“有所提高”的概率增加约 13.5%。表明被征地农民的纵向经济获得感存在地区差异，中部地区被征地农民的纵向经济获得感较强。

表 7 征地补偿方式对被征地农民纵向经济获得感影响的边际效应

	有所降低		持平		有所提高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边际效应	标准误
征地补偿方式	-0.058*	0.031	-0.030*	0.016	0.087*	0.046
年龄	-0.006***	0.001	-0.003***	0.001	0.009***	0.002
性别	-0.032	0.056	-0.016	0.029	0.048	0.084
婚姻状况	-0.023	0.082	-0.012	0.041	0.035	0.123
户主	0.035	0.045	0.018	0.024	-0.053	0.069
受教育程度	-0.029	0.023	-0.015	0.012	0.044	0.035
健康状况	-0.039*	0.021	-0.020*	0.011	0.059*	0.031
工作状况	0.014	0.034	0.007	0.017	-0.022	0.051
户籍是否变化	0.017	0.041	0.009	0.021	-0.025	0.062
是否有村干部	-0.021	0.035	-0.011	0.017	0.031	0.052
家庭社会关系网络	-0.031*	0.018	-0.016*	0.009	0.047*	0.027
村庄交通条件	-0.005	0.022	-0.003	0.011	0.008	0.034
村庄基础设施条件	0.006	0.026	0.003	0.013	-0.008	0.039
征地时间	-0.015***	-0.015	-0.008***	0.003	0.023***	0.008
中部地区	-0.089**	0.043	-0.046**	0.022	0.135**	0.063
东部地区	0.025	0.044	0.013	0.021	-0.038	0.065

注：①\*\*\*、\*\*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汇报的标准误是聚类到村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 （三）对估计结果的进一步检验

前文着重分析了征地对农民经济条件自评这一主观指标的影响，接下来使用经济收入的客观指标进行验证分析，OLS 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从结果中可以看出，征地均能提高农民的家庭总收入和家庭人均收入，并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与汪险生和郭忠兴（2017）的研究结论一致，即征地能够显著提高农民的收入。这说明农民被征地后，其经济状况确实有所改善，进而提升其主观获得感。此外，从对征地政策满意度的调查结果看，31.29% 的被征地农民表示不太满意，31.97% 的被征地农民觉得一般，36.74% 的被征地农民觉得比较满意或者非常满意。这表明现有的征地补偿政策，整体而言能够被大多数被征地农民所接受，但是，就农民的经济获得感而言，还有提升空间。

表 8 征地对农民家庭总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

	家庭总收入	家庭人均收入
土地被征	0.122*	0.093*

被征地农民的经济获得感提升了吗？

	(0.064)	(0.05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0.143***	8.927***
	(0.250)	(0.230)
观测值	901	901
Prob>F	0.0000	0.0000
R-squared	0.278	0.308

注：①\*\*\*、\*\*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汇报的是聚类到村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③控制变量同表 2，限于篇幅详细结果未予汇报。

##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 2019 年 2 月~4 月在四川泸县、贵州湄潭、安徽金寨、安徽定远、浙江义乌以及江苏武进 5 省 6 县（区）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 Probit 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有序 Probit 模型分别从横向比较和纵向变化两个维度分析了征地对农民经济获得感的影响。研究表明：

第一，以“本户在村中经济条件的自评”来测度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发现征地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为降低样本选择偏差和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产生的影响，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发现原模型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不同征地补偿方式下，征地对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存在差异，货币补偿和社保安置等多元补偿能够显著提升被征地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而单一的货币补偿对被征地农民横向经济获得感的提升效应则不显著；此外，无论被征地农民的户籍是否发生变化，征地均能够显著提升农民的横向经济获得感。

第二，以“征地后生活水平变化的自评”来测度被征地农民的纵向经济获得感，发现征地补偿方式对被征地农民的纵向经济获得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相较于单一的货币补偿，货币补偿和社保安置等多元补偿能使被征地农民自评生活水平“有所降低”“持平”的概率分别下降约 5.8%和 3.0%，“有所提高”的概率增加约 8.7%，表明多元配套的补偿方式能够显著提升被征地农民的纵向经济获得感。

农民的获得感是土地制度改革的标尺。尽管本文研究表明征地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农民的经济获得感，但补偿方式及地区差异的影响仍然不可忽视。为了让农民拥有更多的获得感、满足感，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通过完善征地补偿方式进一步提升被征地农民的经济获得感，改变单一的货币补偿，采取货币补偿和社保安置等多元补偿方式，同时尽可能地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到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第二，鼓励各地区结合当地的经济水平，考虑农民的现实需求，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多样化的征地补偿方式，让广大被征地农民获得更多土地收益；第三，在征地拆迁政策实现被征地农民户籍身份转变的同时，赋予被征地农民平等的城市居民权利，让其能够充分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义务教育、公共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真正的市民化。

参考文献

- 1.陈莹、张安录, 2007:《农地转用过程中农民的认知与福利变化分析——基于武汉市城乡结合部农户与村级问卷调查》,《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
- 2.程名望、华汉阳, 2020:《购买社会保险能提高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吗? ——基于上海市2942个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
- 3.邓大松、王曾, 2012:《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福利水平的调查》,《经济纵横》第5期。
- 4.高进云、乔荣锋、张安录, 2007:《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管理世界》第6期。
- 5.胡清华、伍国勇、宋珂、欧雪辉、李中, 2019:《农村土地征收对被征地农户福利的影响评价——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经济地理》第12期。
- 6.霍鹏、张冬、屈小博, 2018:《城镇化的迷思: 户籍身份转换与居民幸福感》,《农业经济问题》第1期。
- 7.李鹏、柏维春, 2019:《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行政论坛》第4期。
- 8.梁土坤, 2019:《三维制约: 社会政策对困难家庭经济获得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华东经济管理》第8期。
- 9.梁韵妍, 2016:《广东省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收入问题研究——基于广东省佛山、韶关等6市的调研》,《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第8期。
- 10.刘得明、龙立荣, 2008:《国外社会比较理论新进展及其启示——兼谈对公平理论研究的影响》,《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11.罗伯特·K·默顿, 2015:《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12.马红鸽、席恒, 2020:《收入差距、社会保障与提升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社会保障研究》第1期。
- 13.聂伟, 2019:《就业质量、生活控制与农民工的获得感》,《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 14.戚晓明, 2017:《人力资本、家庭禀赋与被征地农民就业——基于CFPS2014数据的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15.屈静晓、龙方、卢艳, 2016:《失地农民养老保障水平分析: 以长沙市为例》,《湖南社会科学》第5期。
- 16.孙绪民、周森林, 2007:《论我国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理论探讨》第5期。
- 17.汪险生、郭忠兴, 2017:《被征地农民的收入下降了吗——来自CFPS数据的证据》,《农业技术经济》第6期。
- 18.汪险生、郭忠兴、李宁、许恒周, 2019:《土地征收对农户就业及福利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公共管理学报》第1期。
- 19.王浦劬、季程远, 2018:《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人民获得感的意蕴和量度》,《中国行政管理》第1期。
- 20.王恬、谭远发、付晓珊, 2018:《我国居民获得感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财经科学》第9期。
- 21.王伟、马超, 2013:《不同征地补偿模式下失地农民福利变化研究——来自准自然实验模糊评价的证据》,《经济与管理研究》第4期。
- 22.王小映、贺明玉、高永, 2006:《我国农地转用中的土地收益分配实证研究——基于昆山、桐城、新都三地的抽样调查分析》,《管理世界》第5期。

- 23.王瑜, 2019:《电商参与提升农户经济获得感了吗?——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差异》,《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 24.王元腾, 2019:《参照群体、相对位置与微观分配公平感——都市户籍移民与流动人口的比较分析》,《社会》第5期。
- 25.文宏、刘志鹏, 2018:《人民获得感的时序比较——基于中国城乡社会治理数据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第3期。
- 26.杨金龙、张士海, 2019:《中国人民获得感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
- 27.项军, 2019:《客观“获得”与主观“获得感”——基于地位获得与社会流动的视角》,《社会发展研究》第2期。
- 28.袁方、蔡银莺, 2012:《城市近郊被征地农民的福利变化及个体差异——以江夏区五里界镇为实证》,《公共管理学报》第2期。
- 29.张弛、杨燕绥, 2015:《基于生命周期的征地补偿公共治理——以海南省定安县为例》,《公共管理评论》第2期。
- 30.周义、李梦玄, 2014:《失地冲击下农民福利的改变和分化》,《农业技术经济》第1期。
- 31.庄家炽, 2016:《参照群体理论评述》,《社会发展研究》第3期。
- 32.Shelly. E. T., Letitia. A. P, and D. O. Sears, 2004:《社会心理学》,谢晓非、谢冬梅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单位: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光明)

## Has Landless Farmers' Sense of Economic Gain Increased?

Zhao Jingjing Li Fang Li Li

**Abstract:** The sense of economic gain of landless farmers is the touchstone for tes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land acquisition system reform.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data, this article uses the Probit model,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and ordered Probit model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land acquisition on farmers' sense of economic gain from two dimensions of horizontal comparison and longitudinal change. Self-evaluation of the househol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 village is used to measure the sense of horizontal economic gain. It finds that land acquisi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farmers' sense of horizontal economic gain.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ense of horizontal economic gain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y way of multiple compensation methods. Self-assessment of living standard change after land acquisition is used to measure the sense of longitudinal economic gain,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multiple compensation methods can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 farmers' sense of longitudinal economic gain.

**Key Words:** Land Acquisition; Landless Farmer; Sense of Economic Gain; Land Acquisition Compensation